

从玉器考察南中国史前文化传播和影响

杨建芳

(香港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荣誉顾问)

Different cult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south China in upper Neolithic period exists culture transmission. This phenomenon is especially true in jade wares, which transmit to west from coast area in east China.

Key Words :Upper Neolithic Jade Wares Culture Transmission

内容提要 位于南中国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晚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传播、影响等现象,这一现象在玉器中尤为明显。大致传播方向是从今浙江东部滨海地区向西传播,影响至为深远。

关键词 新石器晚期 玉器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K876.8

文献标识码 A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南中国广袤土地上存在众多的文化。各个文化分布范围相对确定,大致上是泾渭分明。但深入考察,便可发现不同地区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传播、影响等现象。这些现象有时在陶器中几乎没有反映,然而在玉器中却很明显。它们主要是镯形玉石耳珰、I式偏心玉石耳珰、II式偏心玉石耳珰、半璧形玉璜和玉琮。文化传播的源头都在现今浙江东部滨海地区(包括杭州湾一带),传播的方向主要是西向,福建、台湾、广东、香港、广西等地,其影响远达长江中游的安徽、湖南和湖北以及西南的贵州、云南和四川,甚而与东北亚日本的史前文化和东南亚地区的青铜文化也有关联,可以说影响至为深远。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一 镯形玉石耳珰

镯形耳珰的特点是中孔特大,因而“肉”部显得极窄,整体状似手镯。大致可区分为小型(直径约2~4厘米)和大型(直径约5~8厘米)两种,或为玉质,或为石质。截面呈圆形、椭圆形、馒头形、多角形、长方形或楔形不等,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玉石材的厚薄和加工的多寡所致。

在南中国,这种玉石耳珰最早见于浙江嘉兴马家浜^[1]、余杭良渚梅园里^[2]等地马家浜文化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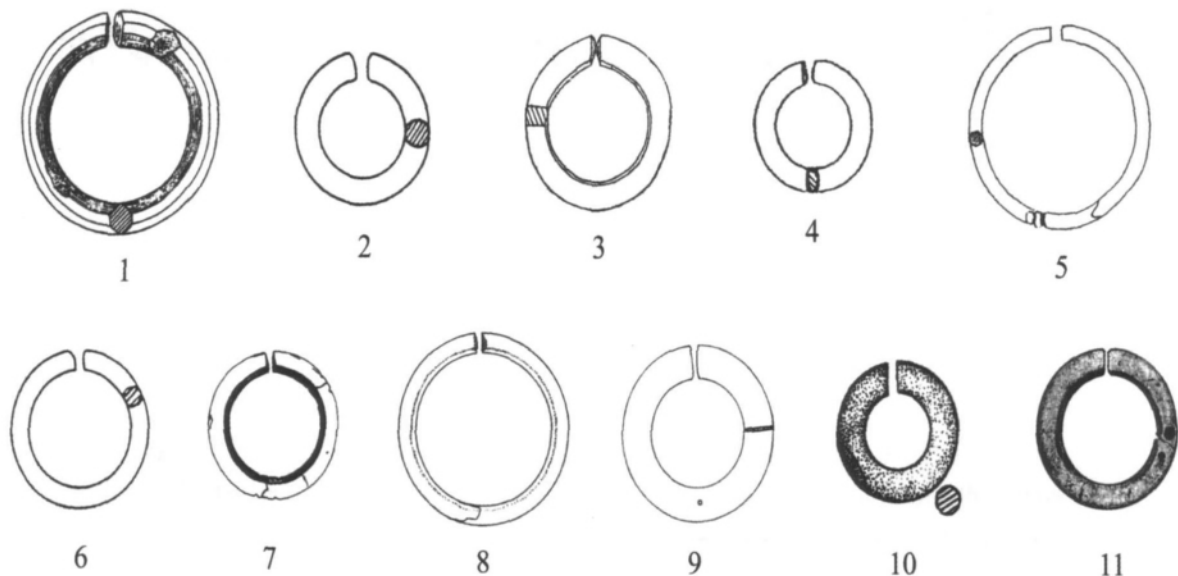
葬出土的玉石饰,有些出土时位于人骨架头部耳际。另外,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一件马家浜文化镯形耳珰(编号01301),似石英质,横断面似椭圆形^[3](图一:1、2)。这些镯形耳珰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

年代稍晚于马家浜文化的江苏高淳薛城遗址中文化层(相当于崧泽文化早期),曾出土一件骨制的镯形耳珰,直径5.8厘米,断面呈椭圆形^[4]。这一发现说明崧泽文化(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200年)可能有玉质的这类耳珰。

继崧泽文化之后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已罕有玉耳珰,但也偶见镯式玉耳珰^[5]。玉石镯形耳珰在毗邻浙江的福建浦城牛鼻山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4000~5000年)的M4^[6]和漳州市虎林山商代浮滨类型文化M8^[7]都被作为随葬品(图一:3、4)。

在台湾台北圆山文化^[8]和台东卑南文化^[9]也出现玉镯形耳珰,不过其年代都较晚,约当周代(图一:5)。

广东北部曲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峡文化^[10],以及东部大埔斜背岭M12^[11]、饶平塔仔金山M15^[12]、揭阳地都油柑山M1^[13]等商代浮滨类型文



图一// 镯形玉石耳珥

1、2. 马家浜文化(浙江嘉兴马家浜 T4M9:2、嘉兴马家浜遗址) 3、7. 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浦城牛鼻山 M4、香港涌浪南遗址) 4、6. 浮滨类型文化(福建漳州虎林山 M8、广东揭阳地都油柑山 M1) 5. 圆山文化(台湾台北圆山贝冢) 8. 青铜时代(香港赤腊角下过路湾) 9. 商代(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 10. 东山文化(越南北部东山遗址) 11. 绳纹时代前期(日本桑野)

化墓葬,也分别出土玉质或石质的镯式耳珥(图一 6)。

香港青山西面涌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14],以及南丫岛深湾^[15]、大湾^[16]、大屿山石壁^[17]、白芒^[18]、赤鱗角下过路湾^[19]等青铜时代遗址和墓葬,也分别出土石质的镯形耳珥(图一 7、8)。其中涌浪南出土的镯形石耳珥年代约为公元前 2600 年~公元前 2400 年,而下过路湾出土的耳珥,有些还大小依次递减成组,这是较为特殊的现象。

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约当商周时期)出土 1 件玛瑙镯形耳珥,已残,直径颇大^[20]。在武鸣、秧岭等地战国墓也随葬镯式玉耳珥,不过形体较小而且断面呈偏长方形^[21]。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玉镯形耳珥多件,直径 7 厘米,缺口相对的一端穿一小孔(图一 9)。这种现象意味着此耳珥的佩戴方式与无穿孔的耳珥或许有异。值得注意的是,浙江象山塔山下层出土马家浜文化玉耳珥^[22]、余杭瓶窑^[23]和瑶山^[24]出土的良渚文化玉耳珥以及江苏吴县岩山春秋吴国玉器窖藏的有凸饰玉耳珥^[25],也同样在缺口相对一端穿孔。这种相同是否暗示其间存在某种关联,这实在值得留意。

这里还应指出,镯式玉耳珥在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Dong Son Culture)^[26]和日本绳纹时代文化^[27]都分别出现(图一 10、11)。越南北部与中国

广西和云南毗连,而东山文化年代又较晚(公元前 3 世纪~公元 1 世纪)^[28],其镯式耳珥渊源于南中国是不难理解的。日本绳纹时代可分为早、前、中、后、晚五期,年代上限约为公元前 8000 年,但有学者认为不超过距今约 5000 年;下限大体在公元前 3 世纪或稍后(前掲书第 469 页)。由于绳纹时代的年代跨度甚大,而有些耳珥的出处不一定有碳 14 的测定年代,故有关早期耳珥年代的判定未必精确。日本学者藤田富士夫将日本列岛耳珥的出现年代定在绳纹时代早期后半,与中国距今 7000 年前的赵宝沟文化、河姆渡文化及马家浜文化并列,但较查海—兴隆洼文化玉珥要晚 1000 年^[29]。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东北查海—兴隆洼文化玉耳珥(距今 8000 年前)是世界上最早的玉耳珥。而东亚出土玉石耳珥的地区都是互相毗连或邻近,其拥有共同的起源(一元论)是显而易见的。早在 1994 年初,笔者对大量出土玉珥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在提交《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究国际研讨会》的论文《耳饰珥的起源、演变与分布——文化传播及地区化的一个实例》中,便明确指出东亚玉石耳珥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其后逐渐向外传播或产生影响;江南地区玉耳珥受北方玉耳珥的影响而产生,然后向西传播至云贵川地区并影响东南亚耳饰;日本的玉石耳珥渊源于中国大陆,其传播路线可能有南北二途,南面

的途径起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滨海地区^[30]。其后,邓聪在1998年、2000年和2006年先后发表的有关东亚玉石耳块的文章,也提出与拙文大致相同的看法^[31]。中日两国学者如安志敏^[32]、藤田富士夫^[33]等,也都倾向于日本耳块渊源于中国长江下游的史前玉石块。虽然日本学者中仍有持不同见解者,但其主张与玉块的发现较为偏离,难于自圆其说。

二 I 式偏心玉石耳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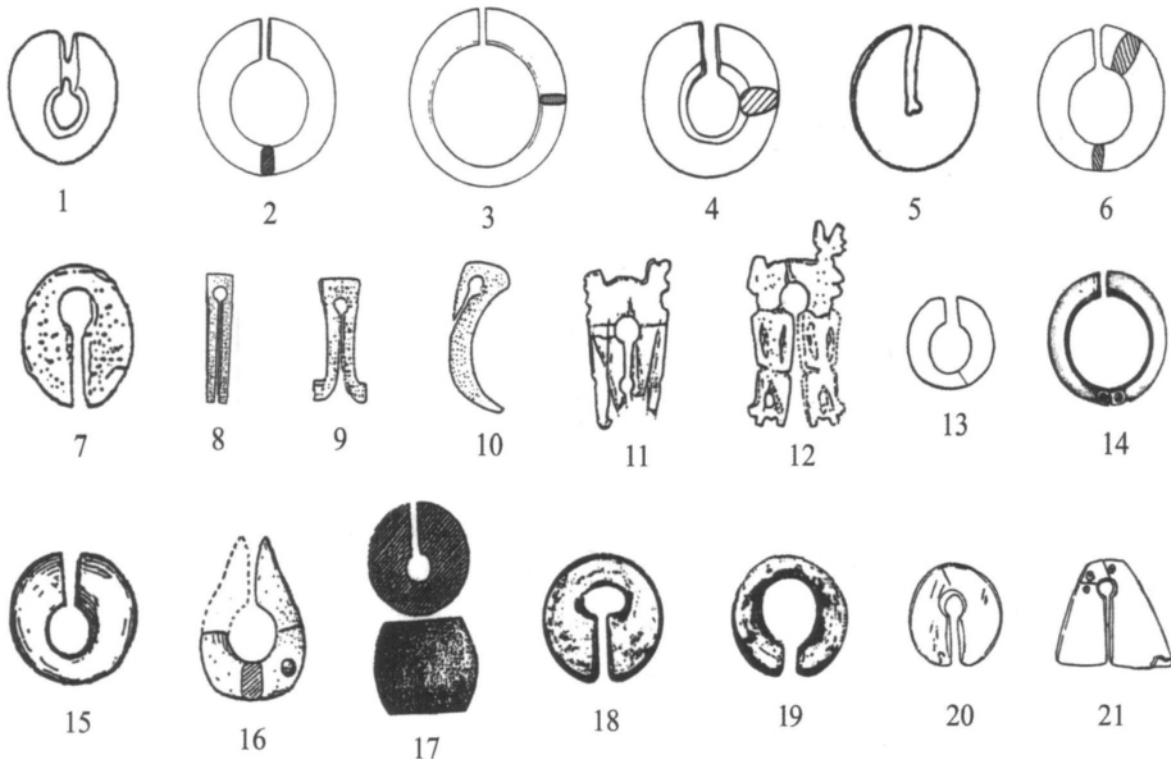
玉耳块中孔的位置有正中心和偏心二种。后者流行于长江以南地区,又可区分为二式^[34]。I 式偏心耳块,其中孔位置偏离缺口,因而缺口部分的“肉”较宽;II 式偏心耳块恰正相反,其中孔位置却偏近缺口,因而缺口部分的“肉”较窄,整体形似新月,故又被称为新月形耳块。

在辽宁—内蒙地区迄今出土的 11 件查海—兴隆洼文化(约公元前 6200 年~公元前 5400 年)玉耳块中,仅有 1 件管状耳块的中孔偏离缺口,其余耳块的中孔全部都位于正中^[35]。不仅如此,整个北中国迄今出土的玉耳块罕见偏心的现象。鉴

于其偏心耳块出现率如此之低而且仅有 1 件,我们认为查海出土的这件管状玉块中孔之所以偏心并非刻意所为,而是由于穿孔定位时偶然的失误所致。

然而,南中国出土的玉耳块却大不相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共发现 32 件石耳块,但出自第 4 层(河姆渡文化层,年代约公元前 5000 年)者仅 6 件,其中半数竟然为 I 式偏心耳块(2 件耳块偏心非常显著)^[36](图二:1)。由于出现率如此之高,这些偏心的作法显然并非出于偶然,而应是刻意所为。这是迄今所知南中国最早的 I 式偏心耳块。

年代稍晚的 I 式偏心耳块见于浙江和江苏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约公元前 5000 年~公元前 4000 年)压饰,数量相当多,出土或采集地点也分布甚为广泛。浙江象山塔山下层^[37]、嘉兴马家浜、吴兴丘城和余杭安溪梅园里^[38]、江苏常州圩墩^[39]、苏州越城遗址^[40]、江阴祁头山^[41]、金坛三星村^[42]和无锡锡山彭祖墩^[43]、上海青浦崧泽下层^[44](图二:2)。必须指出,塔山下层出土的 6 件玉耳块出于 6 座墓(每



图二// I 式偏心玉石耳块

1. 河姆渡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4层) 2. 马家浜文化(浙江象山塔山 M11) 3. 新石器时代晚期(南京北阴阳营 M144)
4、5. 崧泽文化(浙江海盐仙坛庙 M119、江苏江阴南楼 M3) 6~14. 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第5层、台湾台东卑南6件、珠海宝镜湾、香港涌浪南遗址) 15、16. 大溪文化(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大溪 M172) 17. 东山文化(越南北部东山遗址) 18、19. Mojapahit 时期鍍金铜耳块(印度尼西亚东爪哇) 20、21. 绳纹时代前期(日本北海道的关、寿都)

墓 1 件), 竟全部都是 I 式偏心耳块。其次, 金坛三星村墓群共出土 63 件玉耳块, 而 I 式偏心耳块却有 52 件之多, 比例高达 83%。由此可见江浙地区马家浜文化 I 式偏心耳块的流行。

然而, 更令人诧异的是, 年代稍晚于马家浜文化的南京北阴阳营遗址新石器时代墓群(约公元前 4200 年~公元前 3700 年), 共出土玉耳块 46 件, 居然悉数都是 I 式偏心耳块^[45](图二·3) 这也许是中国东南地区 I 式偏心耳块流行的高峰期。

崧泽文化的 I 式玉偏心耳块仍时有所见, 如浙江海盐仙坛庙 M9、M83、M84、M119、M129^[46]、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47]、昆山市绰墩 M6^[48]和江阴南楼 M3^[49]所出土者(图二·4、5)。

可是, 较晚的良渚文化却罕有玉耳块, 更未见 I 式玉偏心耳块。这无疑是江浙地区玉耳块趋于式微的缘故。

另方面, 在福建东部沿海的平潭县, 其海坛岛西北的壳丘头遗址出土一件 I 式偏心玉耳块, 年代约公元前 4000 年~公元前 3500 年^[50](图二·6)。

海峡另一岸的台湾, 当圆山文化和卑南文化时期, I 式偏心玉石耳块甚为流行而且型式较多, 不仅有圆形块^[51], 而且有长方形、几字形块和乙字形块以及外侧有凸饰的有角块^[52], 甚至发展成为造型奇异的人兽形玉耳块^[53](图二·7~12)。

偏心耳块在广东和香港都较为流行。其中的 I 式偏心玉石耳块在广东曲江史前石峡文化遗址曾经出土^[54], 而以珠海宝镜湾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略多^[55](图二·13)。在香港, 这种玉石耳块亦发现不少, 分别出于青山西面涌浪^[56]和赤腊角上过路湾^[57]二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前者年代约为公元前 2600 年~公元前 2400 年, 后者年代约为公元前 3628 年~公元前 2900 年)(图二·14)。

位于江西赣江中游的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也出土 2 件这种偏心玉耳块^[58], 只是年代比广东、香港的史前 I 式偏心玉石块要晚一些。

目前所知, 新石器时代 I 式偏心玉耳块分布最西的地区应是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四川东部巫山县大溪^[59]和湖南澧县城头山^[60]二地大溪文化遗址和墓葬便分别出土多件这种玉耳块, 它们与马家浜文化的 I 式偏心玉耳块极为相似(图二·15)。而大溪墓 M172 出土的一件这类玉耳块, 其缺口部分竟向外突伸以凸显宽度, 成为特殊的实例(图二·16)。

更值得注意的是 I 式偏心玉石耳块在越南和

日本的出现。据报导, 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有片状和鼓状的 I 式偏心玉耳块^[61](图二·17)。在日本九州岛、北海道等不少地方都曾发现这种偏心耳块^[62](图二·20、21)。甚而迟至相当晚的元代, 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还曾流行 I 式偏心鎏金铜耳块^[63](图二·18、19)。影响的深远于此可见一斑。

三 II 式偏心玉石耳块

这种耳块常被称为新月形耳块, 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只流行于南中国, 最早似起源于浙江南部东端属滨海地区的台州一带。据报导, 在台州市灵江中游北岸凤凰山麓江边的史前遗址出土 4 件这种偏心石耳块, 其中 3 件为圆形, 1 件为椭圆形(利用天然砾石制成), 可能属一种新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存^[64](图三·1~3)。值得注意的是, 出土的 4 件石耳块全属 I 式偏心造型, 其中 3 件的偏心还非常突显, 说明其偏心是刻意而为, 并非偶然的失误。其次, 它们被认为可能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物, 虽缺乏直接的证据, 但从其存在直接利用天然砾石制成, 不再进一步加工的手法看来, 明显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以制作工艺而言), 因此将它们视为目前所知最早的 II 式偏心耳块, 并非毫无可能。目前浙江已发现距今 8000~7000 年的跨湖桥遗址, 年代比河姆渡文化更古老。此外, 浙江南部西端的遂昌好川约当夏代的墓 M70^[65]和衢州西山西周初期越人土墩墓^[66]也出土 II 型偏心玉石耳块, 后者约有 9 件之多(依据刊出的图片判断)。这些发现似乎暗示浙江南部可能是这种玉石耳块的起源地。

至于在浙江北部, II 式偏心耳块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开始在江南一带出现, 迄今仅在浙江嘉兴马家浜^[67]、江苏常州圩墩^[68]、江阴祁头山^[69]等几处遗址墓葬发现, 既有片状的也有管状的, 但数量都很稀少(图三·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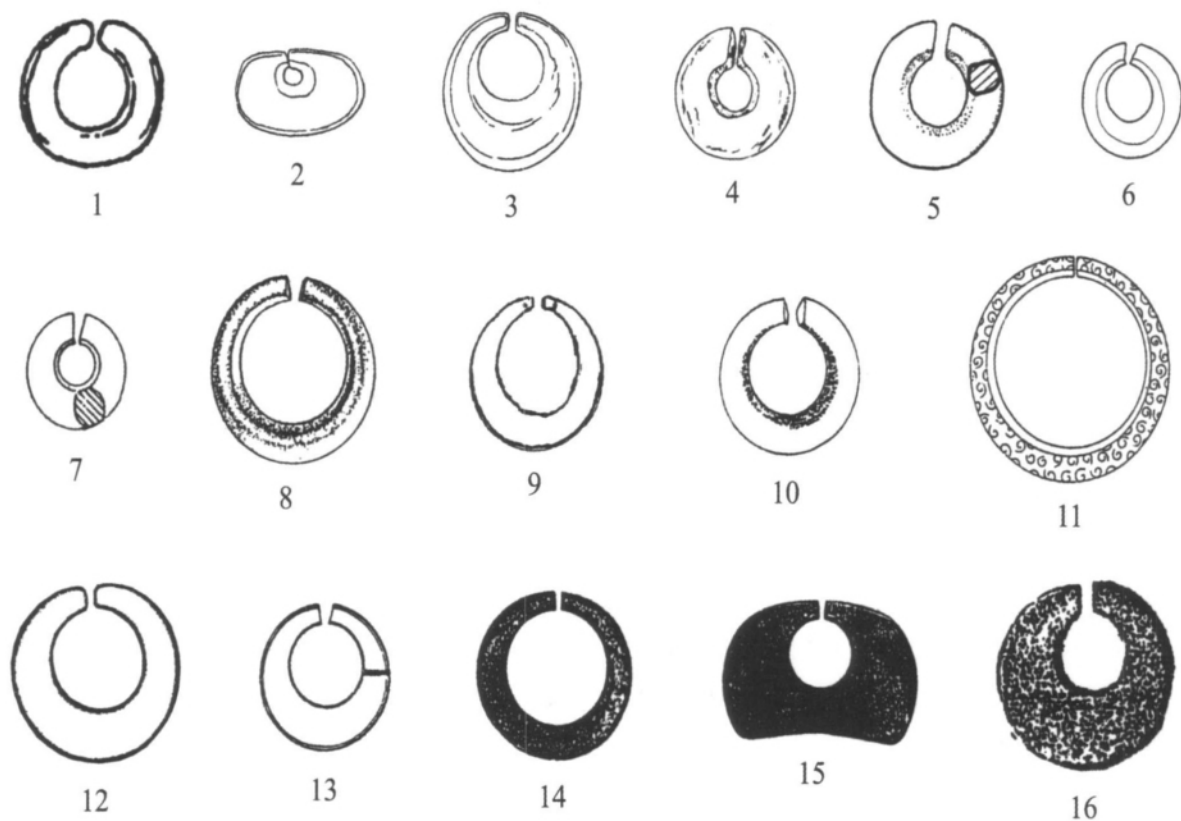
年代稍晚的崧泽文化时期的 II 式偏心玉石耳块,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70]、嘉兴南河浜墓 M15^[71]等处曾出土(图三·5)。

浙江桐乡新地里良渚文化晚期遗址墓 M93, 也出土 1 件这种玉块^[72]。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也出现 II 式偏心耳块, 如四川东部巫山县大溪墓 M107 出土者^[73]。

总括以上的发现, 可以肯定 II 式偏心玉石耳块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并不流行。

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 这种偏心耳块在广东发现略多。曲江石峡文化墓 M20^[74]和珠海宝镜湾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75], 都曾分别出土这种偏心



图三// II式偏心玉石耳块

1~3. 新石器时代早期(浙江台州凤凰山麓遗址) 4. 马家浜文化(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 5. 崧泽文化(河姆渡遗址第1层) 6、8、9. 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珠海宝镜湾、香港马湾东湾仔北遗址、涌浪遗址)(图9为示意图) 7. 浮滨文化(广东揭阳地都油柑山M8) 10. 青铜时代(香港赤腊角下过路湾M2) 11. 西汉(广西普驮铜鼓墓) 12. 战国—西汉(贵州普安铜鼓山墓葬) 13. 战国(云南个旧石榴坝M10) 14~15. 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墓葬) 16. 东山文化(越南北部东山遗址)

水晶耳块(图三:6)。而揭阳地都油柑山^[76]、大埔斜背岭^[77]等地商代浮滨类型文化墓葬,也随葬有II式偏心玉耳块(图三:7)。

在香港,II式偏心石耳块发现尤其普遍。荃湾马湾岛东湾仔北^[78]、青山涌浪^[79]等史前遗址墓葬以及大屿山石壁东湾^[80]、赤腊角下过路湾^[81]、马湾东湾仔^[82]等青铜时代遗址墓葬(商周时期)都出土这种石耳块,而东湾仔北一处出土至少有4件之多(图三:8、10)。这里有必要介绍涌浪出土的一件这种石耳块。此块形体较大,外直径约5厘米,缺口两侧肉部分别加穿一小孔^[83](图三:9)。应当指出,这种在缺口两侧穿孔的II式偏心耳块,迄今在广东和香港还是首次发现,但在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却很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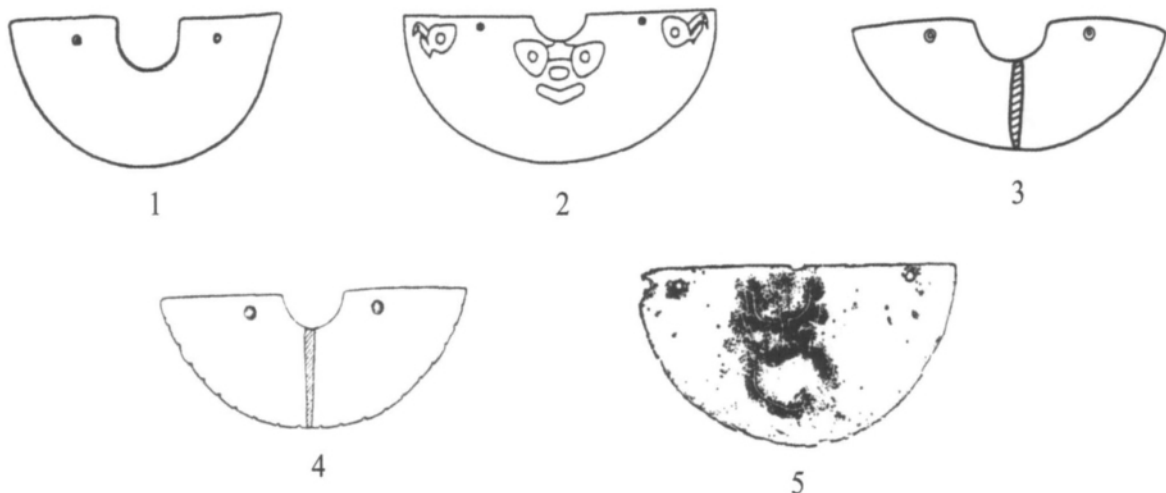
如果说上述地区(江南至香港)出土的II式偏心玉石耳块通常混杂于一般耳块(穿孔正中)中的话,那么在我国西南地区(包括广西)它们虽然出现较晚,却往往是单独或清一色成组出现,而且有些形体颇大。例如,广西西林普驮西汉早期铜鼓

墓出土5件II式偏心耳块,外直径8~11厘米^[84](图三:11)。贵州普安铜鼓山^[85]和威宁中水^[86]战国—西汉遗址墓葬也出土这种玉石耳块,前者至少5件,大小不一(图三:12)。尤其是在云南和四川西部西昌一带,玉石耳块毫无例外都是清一色II式偏心造型,只是年代较晚(战国—西汉)。例如,云南个旧石榴坝战国初期濮人墓^[87]和呈贡小松山^[88]、晋宁石寨山^[89]、江川李家山^[90]等西汉墓以及四川西昌^[91]、凉山^[92]等地西汉墓,都出土II式偏心玉石耳块(个别以骨料制成),而在云南更派生出一个亚型——长方委角凹底的II式偏心玉耳块(图三:13~15)。

还应指出,II式玉耳块在越南北部东山文化也出现^[93],不过其年代晚至战国—西汉时期(图三:16)。

四 半璧形玉石璜

半璧形玉璜最早出现于江苏南部的崧泽文化,如上海青浦崧泽M97^[94]和江苏吴县草鞋山M3^[95]所出土者(图四:1)。其后,这种玉璜在良渚



图四// 半璧形玉石璜

1. 崧泽文化(上海青浦崧泽 M97) 2. 良渚文化(浙江余杭反山 M23) 3. 薛家岗文化(潜山薛家岗 M62)
4. 大溪文化(四川巫山大溪 M140) 5. 良渚文化(湖南保靖粟家坨西汉墓)

文化广泛流行,并成为其主要器类之一。它们见于浙江余杭反山墓 M22 和 M23^[96]、瓶窑^[97]、杭州老和山^[98]等良渚文化遗址墓葬出土玉器(图四 2)。

这种玉璜在安徽潜山薛家岗 M32、M44、M47、M62、T27(4)^[99]、湖北武穴鼓山 M71^[100]等薛家岗文化遗址墓葬都曾出土,甚而湖南华容毛家村车轱山 M113^[101]和更西端的四川东部巫山大溪 M140^[102]等大溪文化晚期墓的随葬品中,也可见到(图四 3、4)。

饶人兴味的是,湖南西部保靖县粟家坨的一座西汉墓出土一件半璧形滑石璜,一面还阴刻一个戴三叉形头饰的人头^[103](图四 5)。这件玉璜的形制与良渚文化晚期玉半璧形璜完全相同,而三叉形饰也是良渚文化流行的玉头饰,但其质料却是滑石,与良渚文化盛行以透闪石玉或阳起石玉琢制玉器大相径庭。这种现象说明这件半璧形滑石璜应是仿良渚文化半璧形玉璜的作品,其年代很可能是良渚文化晚期^[104]。

五 玉琮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玉琮源于长江下游南部的良渚文化(图五 1)。玉琮有高身和矮身两种。根据考古发现,有些中孔较大的一节矮玉琮出土时竟套在墓主的尺骨和挠骨上,显然是被作为手镯使用,其功能与作礼器用的高身玉琮截然不同^[105]。为论述方便起见,本文仍沿用旧说,不作进一步的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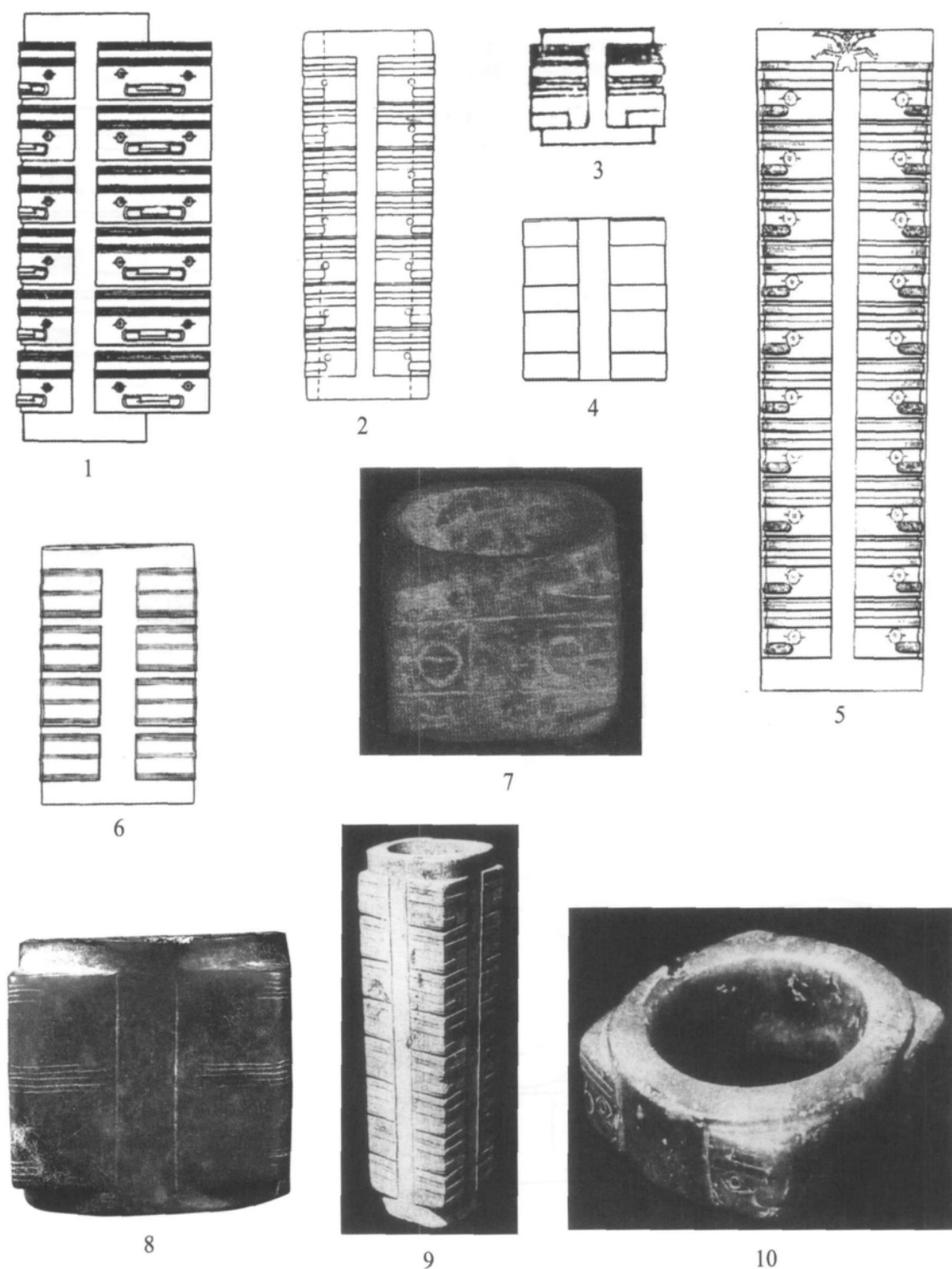
良渚文化玉琮向外传播和对外区玉文化产生影响,这些现象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讨论。在南中国,安徽潜山薛家岗^[106]、定远德胜村^[107]、肥

东刘岗村^[108]、湖北蕲春坳上湾^[109]、荆州马山枣林岗^[110]、湖南安乡度家岗^[111]、四川广汉真武村^[112]、三星堆^[113]、成都金沙遗址^[114]、江西丰城和靖安^[115]等地,都零星发现玉琮(图五 2~10)。然而,更令人瞩目的是广东地区出土的玉琮。目前所知,广东发现的玉琮共有 10 件。其中 6 件见于曲江石峡文化墓葬随葬遗物,其余分别出自曲江乌石镇床板岭、封开杏花镇鹿尾对面岗和海丰田墘镇盐场^[116](图六 1~9)。

以上各地出土的玉石琮大致可区分为四类。第一类其神人面纹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相同,甚至玉材也相同或近似(透闪石玉或阳起石玉),如定远、肥东、丰城、金沙和乌石等地出土的简化神人面纹高身玉琮以及蕲春和靖安出土的矮玉琮。它们应是良渚人所琢制,后来传播至其它地区。

第二类其神人面纹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雷同或相似,但玉材却大异,如石峡文化的高身多节大玉琮,其质料均为灰色硅卡岩。显然,这件玉石琮是在石峡一带就地取材琢制而成。

第三类玉石琮其复杂或简化的神人面纹与良渚文化玉琮近似,但具有非良渚文化玉琮神人面纹的特点。例如,海丰玉琮神人面有四眼或有圆眼眶而无眼角,封开玉琮下端琢出单独的二凸棱(简化羽冠)而无眼鼻,石峡的一节矮玉石琮神人面或简化为上下二道短凸棱,或鼻形厥如,或上端的二道凸棱厚度相差悬殊,眼侧有耳以及鼻下有口,等等。显然,这些玉琮是仿良渚文化玉琮,却添加了新的特色。这个现象说明它们应是广东地区琢造



图五// 玉石琮

1、2、3、5、9、10. 良渚文化(江苏武进寺墩遗址、安徽定远德胜村、湖北蕲春塆上湾、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江西丰城、靖安)
4、6、7. 新石器时代末期(湖南安乡度家岗墓葬、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广汉真武村) 8. 新石器时代末期~夏代(四川广汉三星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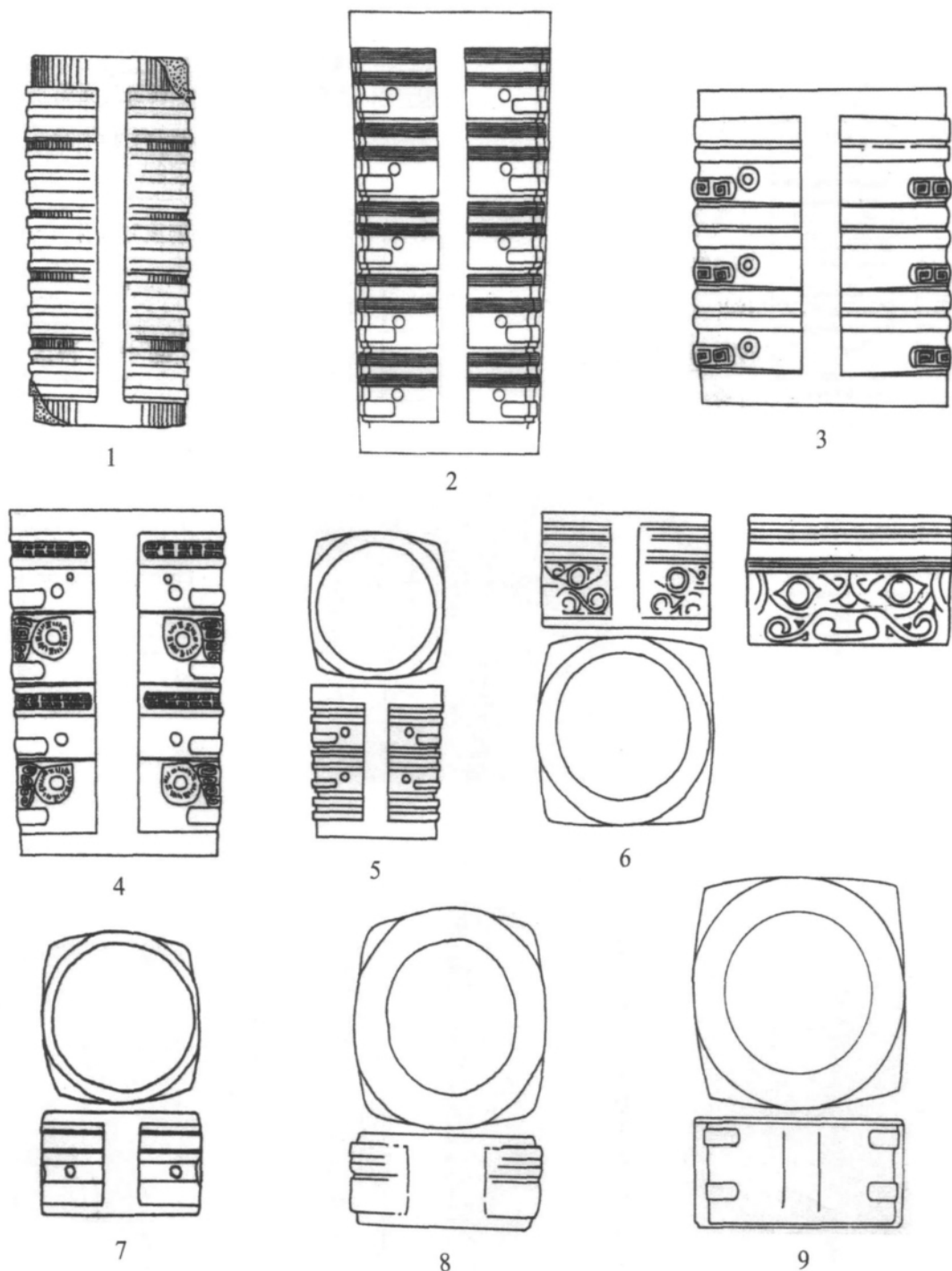
的仿品。

六 余论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史前时期南中国以浙江为中心的玉文化西向和东向的传播和影响。

文化传播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都离不开人类的活动。这里仅以广东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神人面纹玉石琮为例进行讨论。

如上面所指出,广东出土的玉琮为数较多而



图六// 玉石琮

1、6~9. 石峡文化(广东曲江石峡 M105、M17、M10、M69、M104)

2~5. 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曲江乌石床板岭 M3、海丰田墘三舵2件、封开禄美村 M1)

且十九都是当地的仿良渚式玉琮的产品。而众所周知,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面纹和神兽面纹,都是良渚人崇拜的神灵的造型,也就是他们信奉的氏族部落神祇。在古代,先民恪守“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的原则,因为“鬼神非其族,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石峡人和海

丰田墘三舵史前先民之所以琢造这些玉琮,是因为这些神人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否则无法解释。如果这一推论不误的话,则他们与良渚人有着相同的氏族部落神祇。换言之,他们与良渚人原本属同一族类,后来虽然移居广东地区,却仍信奉原来的氏族部落神祇,因而琢造出这些神人面纹玉

琮。由于辗转迁徙费时和在广东落地生根已有若干时日,他们琢造的神人面形象便难免与故乡的良渚玉琮神人面形象有所出入,但也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而已。由石峡、封开、海丰等地出土的玉石琮,进而推论广东史前部分居民来源于浙江地区。这个结论对广东早期历史的研究也许可供参考。

(本文插图承蒙林继来先生输入计算机,谨致谢忱。)

- [1]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
-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精华》,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 [3][38][67]孙国平《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玉琮考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报》第6辑,第81~88页,图十一、十二、十六、二十~二十三、十五、十八。
- [4]南京市文物局等《江苏高淳县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5期。
-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7页,彩版七3,图二〇9。
- [6]福建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牛鼻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 [7]福建博物院等《福建漳州市虎林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2期。
- [8]黄士强《玦的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37/38合期,黄士强《台北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图版三2(上中图及左下图),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84年。
- [9]宋文熏《论台湾及环中国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第139页,图版貳4(右上),台北,1989年;宋文熏《台湾兰屿发现的石制雕刻品》,台北《故宫季刊》第14卷3期46页,插图三22,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东亚玉器》(邓聪编),第一册,第358页,图37.3:1,香港,1998年。
- [10][54][74]杨式挺《广东史前玉器初探》《东亚玉器》第一册,310页,图32.5 23、7、9,彩版153、151。
- [11][77]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大埔县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1期。
- [12]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省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文物数据丛刊》(8),第101页,图四7。
- [13][76]广东省博物馆等《揭阳地都蜈蚣山遗址与油柑山墓葬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5期。
- [14][56][79]秦维廉《涌浪南的新石器中期及晚期文化》,《东南亚考古论文集》第461页,图9,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出版1995年;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6期。
- [15]余元熙等《离岛区古物古迹》第41页,图3(右),离岛区议会出版1993年。
- [16]A. Daniel J. Finn, Archaeological Finds on Lamma Island Near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icci Publication, 1958, PP. 146&150, Figs. 33 :2&4, 35 :12 ,15&17, Pl. 46 :A&F. B. 区家发等《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简报》《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第198页,图26~8 2、6及7,香港,1994年。
- [17]Walter Schofield, An Archaeological Site at Shek Pik, Journal Monograph I,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75, P. 12, Pl. CIII :14.
- [18]邓聪等《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6期。
- [19]William Meacham et al,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 Journal Monograph IV,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PP. 179~181, Figs. 6. 28~6. 32. 邹兴华编辑《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第233页,图203。
- [2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0期。
- [21]蒋廷瑜、彭书琳《广西先秦两汉玉器略说》《东亚玉器》第二册,第113页,图47.1 :11及18。
- [22][3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报》1997年,第38页,图一九。
- [23]林业强编辑《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玉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8年,第96页,图48。
-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遗址1996~1988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2001年第12期。
- [25]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窖藏》,《文物》1988年第11期。
- [26][61][93]Nguyen Kim Dung, Ancient Jade manufacturing Tradition in Vietnam,《东亚玉器》第二册,第392页,图74、9(中),第390页图747 :4及9、747 :1及7。
- [27][33]藤田富士夫《日本列岛的玦状耳饰的始源に关する试论》,《东亚玉器》第二册,第316、439页,图66.2 :16~20。
- [2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 [29]藤田富士夫《日本列岛佩玉装饰品的考察》《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86页。
- [30][34]杨建芳《耳饰玦的起源、演变与分布——文化传播及地区化的一个实例》《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臧振华编辑)(下册),第919~959页,台北,1997年。此文后来收入《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杨建芳著)(下册),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39~167页。
- [31]邓聪《东亚玦饰起源的一些争论》《红山文化研究——

- 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第 498、500 页。
- [32]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 年第 5 期。
- [35] 方殿春:《阜新查海遗址的发掘与初步分析》,《辽海文物学刊》1991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 1992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 年第 1 期;杨虎、刘国祥:《兴隆洼文化玉器初论》,《东亚玉器》第一册,131 页,图 13.4 3、4、7、9、10、11。
- [36] [70]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孙国平:《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玉块考察》,第 74~75 页,图一、二。
- [39] 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 年第 2 期;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 年第 4 期;常州市博物馆:《1985 年江苏常州圩墩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 年第 1 期。
- [40] 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 年第 5 期。
- [41] [69] 杭涛等:《江阴祁头山遗址考古获新突破》,《中国文物报》2001 年 2 月 28 日,附出土玉器图(左列:1~2,右列:2);祁头山联合考古队:《江苏江阴祁头山遗址 2000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第 12 期。
- [42] 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 年第 2 期。
- [43]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无锡锡山彭祖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 年第 4 期。
- [44] [94]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第 26 页图二二·3,第 37 页图三〇·5、6。
- [45]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93 年,第 75 页,图四〇·1。
- [46] 王宁远、顾晓峻:《崧泽早期玉器的几个特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 6 辑,第 105~107 页,图一·2、3、4、6、7。
- [47]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徒磨盘墩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 年第 2 期。
- [48] 苏州博物馆等:《江苏昆山市绰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0 年第 1 期。
- [49] 江苏江阴南楼遗址联合考古队:《江苏江阴南楼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7 期。
- [50]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 年第 7 期。
- [51] 梅原末治:《史前の玦状耳饰じ就いての所见》,转引自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 年第 5 期;黄士强:《台北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图版三:2(左下),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84 年;宋文熏:《论台湾及环中国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第 139 页,图版二·4(中右);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358 页,图 37.3 2。
- [52] 宋文熏:《论台湾及环中国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第 139 页,图版二·4(上左及中左);陈仲玉:《曲冰史前遗址——台湾一处高山古墟》,台北《历史月刊》21 期(1989 年 10 月),89 页,中图。
- [53] 宋文熏、连照美:《台湾史前时代人兽形玉玦耳饰》,《考古人类学刊》第 44 期。
- [55] [75] 李世源、邓聪主编:《珠海文物集萃》,图 62、64、65、66、67,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2000 年,第 42 页;李世源:《珠海、澳门近年出土水晶器、玉器试析》,《东亚玉器》第一册,图 34.1:1,彩版 206、208 及 209,香港 1998 年,第 324 页。
- [57] William Meacham et al.,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94, P. 147, Fig. 5.22 (KLW 111)。
- [58] 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第 145 页、图七五·9。
- [59] [102] 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 年第 4 期。
- [6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 年,第 29 页,附图(城头山大溪文化墓出土玉玦);何介钧:《湖南史前玉器》,《东亚玉器》第一册,图 24.2:19 及 25,彩版 90,香港 1998 年,第 223 页。
- [62]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 年第 5 期;周南泉:《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5 期;藤田富士夫:《日本玦状耳饰起源试论》(日文),《东亚玉器》第二册,第 314 页,图 66.1 之 E 行三图;上田耕:《九州岛的玦状耳饰》(日文),《东亚玉器》第二册,第 341 页,图 69.2:16、30;宏明等:《日本北海道旧石器时代及早期绳纹时代的玉类》(日文),《东亚玉器》第二册,324 页,图 67.2 29~31。
- [63] Susan Rodgers, Power and Gold Jewelry from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second edition (Prestel~Verlay, 1988), P. 49, fig. 43 (upper, right)。
- [64] 王子:《浙江台州灵江出土的史前遗物》,《东南文化》1998 年第 3 期。
- [6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第 91 页图六一:13。
- [66] 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考古》1984 年第 7 期。
- [68] 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 年第 4 期。
- [7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发掘简

- 报》,《文物》2005年第6期。
- [7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桐乡新地里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 [73]邓聪编《东亚玉器》第三册,彩版84,香港,1998年。
- [78]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等《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史前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6期;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6期。
- [80]Walter Schofield, An Archaeological Site at Shek Pik, Journal Monograph I,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75, Pl. CXVII 3.
- [81]William Meacham et al,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 Journal Monograph IV,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P. 180, Fig. 6. 30.
- [82]邓聪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92页,图10、6(最上端),香港,1998年。
- [83]此石耳玦似未经报导,笔者于2003年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时,见其陈列于“新石器时代饰物”展柜,原定名“石手镯”(编号11)。
- [8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
- [85]《普安铜鼓山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0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0页左下图。
- [86]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第二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10),第125页,图一九2。
- [87]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考古》1992年第2期。
- [88]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呈贡小松山竖穴土坑墓的清理》,《云南文物》1984年第15期。
- [89]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123页,图版一一四:1、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
- [90]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 [91]四川省金沙江渡口西昌段、安宁河流碱联合考古调查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第2期。
- [92]凉山彝族自治州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黄承宗《四川凉山州新石器时代文化调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 [95]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三期,第23页,图七—7,图版三:2(最下者)。
- [9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第283、308页,图二三〇:2及二五〇:3~4,彩版九八一及一一一二、一一一三, B. C. 。
- [97]林业强编辑《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玉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1998年,图46。
- [98]福井县立博物馆《中国浙江省の文物展》,日本福井県,1997年,第44页下图。
- [99][10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9、132、140、142、171、338页,图一〇三:4、一二八:17、一三六:16、一六七:2、三六六:6、图一三六:3~1、3~2。
- [100]湖北省京九铁路考古队等《武穴鼓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3页,图四八:1。
- [101]湖南省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图版一:2(左);牟永抗、云希正主编《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河北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66页,图八九。
- [103]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工作队《湖南保靖粟家坨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9期。
- [104]杨建芳《长江流域玉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7、128页。
- [105]杨建芳《琮为何物——汉儒误释远古礼器一例,兼论周礼六瑞说之不足信》,将刊于《华学》(饶宗颐主编)第九辑(2007年)。
- [107]吴荣清《安徽省定远县德胜村出土良渚文化遗物》,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第155页,图二,图版十一:4,南京,1996年。
- [10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众志美术出版社,台北,2004年,第65页,图三八。
- [109]汪宗耀《湖北蕲春坳上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7期。
- [110]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0页图三五:6。
- [111]何介钧《湖南史前玉器》,《东亚玉器》第一册,第227页,图24.2:16,彩版97,香港,1998年。
- [112]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VI (1933~1934), PP. 128~129.
- [113]陈德安、张光远《三星堆传奇——华夏古文明的探索》,第143页,图124,台北,1999年。
- [11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82~88页,图20~21。
- [115]万良田、万德强《江西出土的良渚文化型玉琮》,《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第157~158页,图版十一:1、2。
- [116]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第106页,图S3、S2、27;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广东文物普查成果图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21~24页,图22~24;杨式挺:《广东史前玉器初探》,第一册,第307~309页,图32.4:1、2、4、5,图32.5:29~34,香港,1998年。